

程志敏 张文涛 主编



从古典重新开始
古典学论文集



程志敏 张文涛 主编



从古典重新开始

古典学论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古典重新开始/程志敏,张文涛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675-3272-4

I. ①从… II. ①程… ②张… III. ①思想史—世界—文集 IV. ①B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8720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从古典重新开始

主 编 程志敏 张文涛

审读编辑 戴连焜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e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50

字 数 5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3272-4/B·923

定 价 12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代序: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张志扬)	1
阿佛洛狄特的缺席(吴雅凌)	29
黑衣女神与城邦福祉(张芳宁)	42
一个故事三种讲法(罗 峰)	56
阿里斯托芬《马蜂》中的父与子(胡 稼)	69
孝义与治道(程志敏)	81
苏格拉底与政治哲学的诞生(王江涛)	100
“知识”与灵魂之“美”(贾冬阳)	117
灵魂的染色(黄 群)	141
被迫的哲学家(李 猛)	160
柏拉图《王制》的心灵(谭立铸)	185
神还是人立法(林志猛)	198
神圣的立法者问题(肖有志)	210
柏拉图《书简二》读解(彭 磊)	221
当哲人遇上智术师(罗晓颖)	234
政制与幸福(陈戎女)	250
色诺芬《阿格西劳斯颂》中的“虔敬”(高挪英)	262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术的定义和定位(黄汉林)·····	276
罗马的“开端”(吴明波)·····	295
维吉尔的“幻梦之门”(王承教)·····	304
世之贤人君子的德性高度(叶然)·····	321
心灵的孤独与统一(吴飞)·····	345
哈列维《赫札尔人书》对希伯来圣经“王”形象的 发展(陈会亮)·····	365
何谓“双天”(白钢)·····	381
爱的忏悔(朱振宇)·····	388
无奈的牧人(李世祥)·····	401
洛克、平等与“我们”(赵雪纲)·····	412
尼采与西方礼法传统的重建(张文涛)·····	428
苏格拉底与阿那克萨戈拉(刘振)·····	448
尼采式的哲学批判(曹聪)·····	465
现象学与古今之争(徐戩)·····	480
隐秘的自然状态(黄涛)·····	499
关雎之始与王道政治(陈明珠)·····	513
《关雎》讲义(李致远)·····	530
帝王的道义与变数(朱赢)·····	539
倾听圣言(赵明)·····	553
君子之乐:《论语》之始(娄林)·····	573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开篇读解(张轩辞)·····	587
《论六家要指》的时代背景和写作意图(吴小锋)·····	603
太史公笔下的孔子(李长春)·····	615
《诗》主言志,最附深衷(张辉)·····	631
虞世南《笔髓论》注(柯小刚)·····	642
万一各正,小大有定(曾维术)·····	657

元代“年谱、传记类”孟学著述三种考议(周春健)	667
等待黎明:为明君献计(何子建)	682
方以智“《庄》为《易》之风、《庸》之魂”说试解(邢益海)	700
“天”变、公理与时势(张翔)	714
被现实主义刻画的中国?(韩潮).....	738
论天下秩序的当代复兴(陈建洪).....	751
矛盾论与政治哲学(丁耘).....	768
传统的活力(舒炜).....	785
编后记.....	793

代序：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

——为小枫耳顺之年而作

张志扬

“文革”后的1979、1980年，我们几乎同时学步邯郸。不过那时你是白纸一张，我却黔印在额满身涂鸦。所以，你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已自惭形秽藏拙于你和你们身后幽僻之处。但命运从此前后相随。

第二个十年，你去了瑞士巴塞尔大学，我去了海口海南大学。

第三个十年，你回到广州中山大学开设古希腊柏拉图学园式的古典学课程，成为中国第一站反省西方启蒙思想之古典学出发点。我却因此成了“游学”在现象学、古典学、科学哲学“概帮”兄弟之间的“民哲”。

三个十年过去，一开始的“前后之分”更着“文野之别”，居然始终相得益彰。这在当今壁垒森严的体制学界，也算得一个例外：“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

其实常识不谙，我们的心曷与指归始终默契，那就是把邯郸学步的漂泊变成归根复命的还乡，从未步浮士德的后尘与靡菲斯特做灵魂的交易。

于是，在你耳顺之年，我拿出延续“阴影之谷”的挂单呼应你“拣尽寒枝”的寂寥，作为“德不孤、道不废”的见证。^①

2014年7月17日 海甸岛

^① 本文系《文革书·四批判书》的准备，继《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之后，对西方哲学史之“双重遮蔽”底翻转，算得我们之间告别西学的承诺。

绪 论

如果我写西方哲学史,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要重写西方哲学史?”

有人还会问:“你凭什么重写西方哲学史?”

前一个问题我在展开中回答。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也会在前一个问题的展开中连带给出。

其实道理很简单,谁干预世界谁就得被世界质疑,否则你与我何干!

有问题的人首先就获得了“质疑”或“重写”的必要条件。一个连问题都没有的人——我指的是“根本性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重写”了。说它是“必要条件”,因为没有它则根本不可能有重写的意识——“无之必不然”,然后才是“有之不必然”——仅有重写的意识,没有重写的的能力,也枉然。

能力是个人的事情,意识却关系到问题本身。我们必须首先面对它。

这个题目隐含的背景无疑是复杂的。撮其要者四。

(一) 东西文化各自的思想或哲学形态都需要时间自身展开、转折、轮回。没有进入这种“轮回”过程我们就无法诊断其兴衰的命脉搏动……

(二) 中世纪后,“以体制用”的东方文化开始愈来愈强地遭遇“以用代体”的西方文化的功利冲击,一改独立互补地相互吸收,不到四个世纪,西方独大而逐渐侵蚀甚至剥夺东方而强行殖民化,变东方为西方“东方学”之“东方”。

(三) 强势文化认为“进步论”理所当然。弱势文化除了自己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别无他途。但是,弱势变强势是进入同样的“强力意志”走“剥夺者被剥夺”的歧路,还是走多元辉映独立互补而回复到各自“本土人类学”之文化生态常路? 如何诊断两种“轮回”的重迭? 于是有

了“犹太人问题与中国人问题”这一历史课题的出现。

（四）或许中国人可写世界史，能“大而化之以致中和”的中国人，在东西正反遭遇的对照中，既重写西方智能史（“以用代体”史），也重写东方智慧史（“以体制用”史），即在总体上迷途指津：明辨“体用之分”、“以体制用”，重建“神—人—物”的制衡关系——既使敬神以节制人的僭越，又使驭物以抵制人的物化，使“人”允执厥中而扣两端（“神”—“物”）地成“中和”之势。否则，必然落入西方“进化论即末世论”诅咒的下场。

【附释】

何谓“犹太人问题与中国人问题”？

或，“犹太人是中国人的一面镜子”。这是我个人自立的课题。它的酝酿有几个阶段：

（1）第一阶段起因于“苦难”。两个民族在各自的历史中都经受深重苦难，但两者对苦难的记忆与消化是非常不一样的。犹太民族的“苦难记忆”如何能保持一个民族文化的神性质量，并凝聚为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甚至把苦难中的坚守看作民族历史品格的高贵性质，特别在知识分子中自觉如此。中国却难能有如此不幸中之幸。往好的方面说，它必须在世俗层面“大而化之”地浴火重生。这个感觉最先表现为“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以八十年代为限。

（2）第二阶段转向对“启蒙”的态度。犹太民族在其民族性上是拒绝“启蒙”的，这无疑对“启蒙的普世价值”是一个否定。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放弃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导师角色，还反过来几乎整体性地向西方一边倒，听信西方口中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以为自己的指导原则。

（3）第三阶段才最终涉及“文化种性”及其如何“复兴”的问题。两者都面临两难：

（3.1）犹太人在二战后面临“犹太复国”的两难选择：靠人的理性建国即建立现代国家，则有悖与耶和华的契约《托拉》（靠神性获救）；若靠神性复国，又难以抚平二战牺牲600万人的伤痛和抵挡外

族历来的驱赶与屠杀。最后还是选择了政治复国主义，建立了以色列国。

(3.2) 中国人在二战后面临“如何建国”的两难问题，即“走什么道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资本主义阶段论道路，还是走“继续革命论”完成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质仍然在于“西化/不西化”问题？^①

今天看来，两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复国”或“建国”的基业上都陷入了困境。所谓“民族复兴”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不仅如此，“文化种性”问题不单纯是“文化类型”问题，它的背景已经同时转变到科学技术与人类存亡的“哈姆雷特式难题”了。它也是西方哲学史上必须正视的“三个幽灵”：俄狄浦斯、哈姆雷特、马克思。

不管德里达如何看待“三个幽灵”，在我眼里“三个幽灵”隐喻的全是“反讽”。请看这“三个幽灵”的身份：

“俄狄浦斯”——古希腊“诸神不和”向“希腊悲剧”的转变启蒙。古希腊人（虚构），选择不惜“改天换地”（“杀父娶母”）与神抗争的“自然人”道路。但这正是一条兑现神之诅咒的道路。

“哈姆雷特”——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但写的是中世纪寒冷的北欧。丹麦人（虚构），选择“人道用死于功利阴谋以证实功利阴谋之丑恶”，必然走上“在假象本质的批判中承认假象本质”的“纵恶”之路。

马克思——19世纪的欧洲，批判资本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盛行，晚到的德国浪漫派新古典主义哲学由盛而衰，直接导致短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犹太人（真实），选择“物化生产力解放人类而终被非人属的科学技术物化了人类”。“历史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终究是“唯物”的，正是西方宇宙论科学功利道路的最后转折。

所以我宁可说他们是三个“反讽的幽灵”，隐喻的只是“反讽”——

^① 马克思主义道路也是西化道路，而且还是全盘西化的技术理性科学主义道路。但对这一点的认识与反省需很晚才出现。

人愈抗命神的诅咒愈陷入“神对人的诅咒”——“斯芬克斯之谜”。因为西方人像俄狄浦斯那样只知一个空洞的“人”而不自知“人如何成其为人”，结果才导致完全的“非人属”的科学主义物义论——归根结底陷入“斯芬克斯之谜”的诅咒之中。

但是请注意：正是最后这个真实的犹太人马克思唤醒了远东的中国人，当西方人普遍沉入“以用代体”而科技化之时，中国人唯有借“生产力之用”做大以匹西方，别无他途，但危险在于，将遭受西方“以用代体”之代价而最终丧失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种性”——无体而用啊！所以，必须坚持“中体西用”，即中国文化“德性之体”制御科学技术以为“用”，方能调正世界发展方向使“大而化之以致中和”。这或许预示着“反讽”命运的解脱？^①

（附释完）

可惜，这个中国人还需时日到来。

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学习西方已有170年的时间了；如果从1894年“甲午战争”算起，中国学习西方已有120年的时间了。从今天中国的教育现状看，特别是从主流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不认同看，这个学习过程远未结束而且前途未卜。其结果大体可用西方和中国的两个成语对勘：“阿喀琉斯追不上龟”与“邯郸学步”。

“阿喀琉斯追不上龟”说的是，阿喀琉斯如果只按龟的规则追龟，的确，永远也不会追上龟。因为阿喀琉斯每次起步追赶只能追到龟同时起步的地方，所以，阿喀琉斯永远会差龟走出的那一步。说白了，西方必须始终站在“主人位置”奴役你，因而“钳制你、围堵你、卡死你”是不可避免的遭遇。等到你真的能战胜了，说不定也就真的西化了，落入“剥夺者被剥夺”的强力意志地步——中国已不复是中国了——反讽！

①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系《文革书·四批判书》底批判之一。此处存而不论。

“邯郸学步”说的是，别人的步伐没学到，自己的步伐却丢掉了。因为，人类四大原生文化——埃及、西亚、印度、中国——各不相同。西方开元的希腊文明是地中海区域的文化类型，中国是东亚大两河流域的文化类型（区别于西亚、印度各自不同的两河流域文化）。抹掉文化类型，宣扬世界一元论的历史观不过是“帝国梦想”的“意识形态”罢了。

学到今天，也该到了反省的时刻。至少明白“学习”归根结底的目的是找回民族品格、确立民族品格而不是丧失民族品格。因此，在学习中“知己知彼，主位在我”才是学习的要津。那种鼓吹“全盘西化”，盲目信仰“凡西方皆真理”的“奴化学习”与“学习奴化”，实乃学习的大害，必须扫荡干净！

一、西方哲学史的历史编年

引 言

西方哲学史浩如烟海，西方思想家哲学家千百年来始终如一地“计算”他们的思想为“最高真理”、“普世真理”、“绝对真理”，如“一神论”、“本体论”，非“天下独尊，舍我其谁”不可。并以“真理”统“至善”，即便“真理是毒药”——真理是“唯物”而不是“为人”——也在所不惜。因而一开始就隐含着“以用代体”之动力趋势。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思想描绘为独照真理、显现真理的“光”——“自然之光”，实乃“双重遮蔽”之源。

【附释】

所谓“双重遮蔽”，得分三层解释。

一层是表层即“光”——“象征性”（类似柏拉图“本相”——“本质主义”）。光遮蔽（消除）黑暗，又把这遮蔽遮蔽起来，如此显得纯粹光明（白色神话）。遭黑格尔反讽“纯粹的光明如同纯粹的黑暗什么也看不见”。

二层是中层即“真”——“真理性”（类似亚里士多德“实体”——“科

学实体主义”)。组成所谓希腊独有的“爱智慧”其实“爱智能”的“哲学”。如此真理，既掩盖人为建构不可避免地先天裂隙，又把这掩盖掩盖起来，俨然“真理”自居美名之曰宇宙“最高存在者”——“本体”——“物理学之后”(误译成“形而上学”)。

三层是底层即“善”——“道德性”，词语上“善”与“好”同，已表征着“真”对“善”即“知识”对“德性”的规定，从而定位在“功能性”上。这使真掩盖善之为善，即非智能性非知识性善，又把这掩盖掩盖起来。总之，“真理”取“神”而代之亦取“德”而代之，成为主宰“人”和“物”的至高无上的“强力意志”。

这就是“西方意识形态”、“西方中心论”的基本特征。

正因为如此，“重写西方哲学史”，必须打破“西方意识形态”、揭穿“西方中心论”和“以用代体”论，给它一个大时段的历史编年，让其整体轮廓在其中透射其表里——还它“地中海区域”的“本土”性质——“本土形而上学”(表：“思维的形式”)与“本土人类学”(里：“欲望的本质”)。

以深受地中海区域之古埃及文化和西亚文化影响的希腊哲学为开端、雅典为中心，以内部奴隶制和外部殖民地为基础，经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时期，直到罗马帝国的灭亡，系第一阶段，历时公元前后各500年。

第二阶段是欧陆中世纪神学，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历时千年。

第三阶段进入近代史，含意大利文艺复兴、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启蒙运动、德国新古典哲学等。欧洲一旦获得新的科技力量便南扩至非洲、东扩至亚洲乃至大西洋西岸的拉丁美洲并迅速建立世界性殖民地，但由于后起的帝国主义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仅20世纪上半叶就接连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虽然也伴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仍统属欧洲殖民主义时期，历时500年。中国被“半殖民—全西化”之“西学东渐”百年便在其中。

第四阶段即跨入现代性后现代性阶段，欧洲人文哲学让位给英美

分析哲学,直到哲学沦为科学的婢女,遂使科学技术成为世界性的“物欲领导者”,已历时近百年。

简约:

- (1) 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后各 500 年,“帝国思想”形成期);
- (2) 中世纪神学时期(约 1000 年,“普世神学”形成期);
- (3) 工业革命、启蒙思想等殖民时期(约 500 年,“帝国思想”争夺期);
- (4) 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时期(近 100 年,“普世科技”转接期)。

事实上,西方的崛起,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 17 世纪算起,也不过 400 年历史。此前 1000 年是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笼罩下的教政合一。且三大一神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内外“诸神不和”,圣战不断。此后就是 400 年欧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掠夺时期,其对土著民族几乎赶尽杀绝,紧接着就是黑奴贩卖史、殖民劳工史、妓女史和战争史,层出不穷。20 世纪上半叶欧洲爆发了两次所谓“世界大战”其实是殖民地争夺战,被世界历史叫做帝国主义的“战争世纪”、“灾难世纪”,也是帝国主义本性大暴露的世纪。这造就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845 到 1991,历时 146 年,并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性风潮。其中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即与帝国主义对峙的冷战时期只有 74 年(1917 到 1991);共产党建国到毛泽东去世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仅有 27 年(1949 到 1976)。

人们的历史记忆,怎么会如此地倒错——“厚爱”漫长的侵略者而“鄙薄”短暂的民族复兴者!

帝国主义在欧洲二战后调整了策略:

首先,“内外有别”:欧洲北美内部求同存异、洛克主义的“自由原则”(属于“主人道德”);再“一致对外”,施米特主义的“政治成熟”、霍布斯主义的“丛林原则”;二战后帝国主义老谋深算地布置世界格局,基本以“分而治之”为原则,例如欧洲的德国,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日本,中东的以色列之于巴勒斯坦及其阿拉伯世界等。

其次，两大阵营冷战僵持，西方则奉行“和平演变”：围堵与渗透。

但根本上是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足与“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理念与政策的幻想错误导致了彻底失败。其三大根本性失误：

(1) 在无产阶级民主观念下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落入法国大革命“民主悖论”言筌，从上到下伤害了大批无辜民众，特别是将原来道义上支持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打入”敌对阶级；

(2) 政治、军事与经济的被迫防范与过度失衡造成了国民生活水平低下。

(3) 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决策者错误，包括不顾一切的试验心里，为了完成“悲剧性的历史使命”。

结果竟如此吊诡地使新生的无产者社会主义变成了独裁魔鬼，而使魔鬼的帝国主义变成了民主天使。也就是说，人的社会性突然反转为人的私人性（追求个人享乐和无限欲求），其中尤其以知识分子一马当先地倒戈成为帝国主义最积极的传道士。以致日裔美国人福山写出《历史的终结》这样的谄媚之作。只能找到一个最直接的原因：“资本—技术—欲望”对人性“解放到坠落”的诱惑！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思想家、东方思想学者，走出了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揭露资本的罪恶而一反常态地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并且极端地宣扬“个人主义”并把“性欲与享乐”宣称为最基本的人权，以对抗任何精神理想追求，一概将后者斥之为“乌托邦”幻想。

于是，他们的历史由描绘形而上学真理的历史转变为描绘人性不断下行之欲望的历史。人们视为当然。结果，追求形而上学“本体论”、“一神教”、“强力意志”的帝国梦想史也随之变成“个人单子化”、“民主自由化”、“人权欲望化”的科学技术功利主义历史。“西方中心论”更将其如下行的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推论为“普世价值”，隐蔽而现实地推进“科学帝国”的实现。

由此可见，哲学形而上学在西方乌托邦时期堪称思想的引导者，其

政治哲学本质还隐伏着。形而上学的幻象被揭穿后，虚无主义便畅行无阻，其政治哲学本质也就走上前台撕下遮盖布而公然宣扬科学主义的强力意志。彻底完成了即走上了“以用代体”的物义论道路——取代“人文精神”的“科学技术”成为世界的主宰。

只有把西方哲学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历史段”上看，只有发展到宇宙论的科学技术成为世界的主宰，“神义论”也好，“人义论”也好，才彻底被“物义论”宣判死刑。我们才能看清西方文化种性“神—人—物”一路下滑的历史归属。人只有在“非人属的铁血灾难”中才能真正懂得三个幽灵的“反讽”——兑现“斯芬克斯”诅咒——“进化论即末世论”的同道同归！

二、西方“本土形而上学”底人为建构与先天裂隙

引 言

“本土形而上学”即“西方形而上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写作计划，本应该严格称呼其“物理学之后”，是东方自己把它翻译成“形而上学”造成了普世混淆，即“西方形而上学”的“技术理性”特征及其“以用代体”倾向，与“东方形而上学”的“天人合一”、“以体制用”倾向的根本混淆。以致现在澄清起来格外麻烦了。为迁就已成习惯的“形而上学”流行用法，下面的行文中虽不强用“西方本土形而上学”，但其地中海“本土”实质是必须认定的。

希腊哲学具有西方哲学一切形式的萌芽。

形而上学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本质主义”（柏拉图主义）与“实体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怀疑主义”几乎可以看作它们的否定形式，以及由此导致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形成“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两极摇摆的西方哲学史特有现象。

先按照“经验”（如生活常用的“海盗经验”、奥林匹斯“诸神经验”与奥林匹克“竞赛经验”）的优胜劣汰方向进入，把如何优胜劣汰的“规律”（可知的“存在（者）”——“度”）及其承担者（可见的“存在（者）”）定格下来

成为“真理”（“存在者的存在（者）”），并纳入智能性的可推理、可计算、可重复的实证制作过程（“思维着的存在（者）”）。经由“物理学之后”再上推到“最高存在着”即“不动的推动者或第一推动者”。完成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计算（三大实体：“可见实体”，“可知实体”，“最高实体”）

以上属古希腊“自然理性”（政治哲学则叫“自然法”即“自然正当”），亦叫“自然之光”。这“自然之光”一度湮灭，即随着“雅典帝国”与“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湮灭（据传被阿拉伯文化保存），在基督教中世纪，历时近 1500 年。16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7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19 世纪德国新古典哲学兴起，逐渐复活了古希腊“自然理性”，使其亚里士多德开启的“物理学之后”，被后来的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即“本体论同一”构造成“普遍真理”，从而把希腊的“自然之光”描述成“双重遮蔽”的“白色神话”：既遮蔽“本体论同一”之先天裂隙，又把这“遮蔽”遮蔽起来。只有少数临界思想的哲学家意识到或半意识到这种“双重遮蔽”，遂有一系列否定命题出现。

1. 本土形而上学开端的三个“前 X”模式（略）

如何确定开端就如何确定哲学史的性质与走向。

（1）“前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史（黑格尔）——形而上学主流

（2）“前柏拉图”——“虚无主义”史（尼采）——虚无主义
——“政治哲学”史（施特劳斯）——反虚无主义

（3）“前苏格拉底”——“存在遗忘”史（海德格尔）——临界思想

“前苏格拉底”之“存在”的三个开端

巴门尼德——存在即一——形而上学倾向

赫拉克利特——存在即变——怀疑论即虚无主义倾向

阿那克西曼德——存在即裂隙——临界思想发端